

内蒙古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建国以来开垦对兴安盟地区造成的负面效应

姓名：英格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

指导教师：孟庆国

20090406

中 文 摘 要

建国以来,兴安盟地区进行了大面积土地开垦活动。兴安盟耕地面积的动态变化及其趋势特征与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来土地开垦活动的兴衰和耕地面积的变化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共出现过四次垦荒高潮,分别为: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时期、三年困难时期、十年动乱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持续至今等四个时期。土地开垦活动具有长期的历史原因和文化根源,受政策制度、牧区人口膨胀、“重农轻牧”的价值观念等因素影响。同时大面积土地开垦也给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开垦直接导致草原生态恶化,对草原的破坏是毁灭性的。许多自然灾害与人类破坏草原生态密切相关,土地的过渡开垦导致干旱、沙尘暴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更为严重的是生物多样性受到极大地破坏,尤其造成了“农进牧退”“沙进草退”的景象,使得很多农牧民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和发展的基础,加大了农牧矛盾,使得农牧地区逐渐贫困化。

对于建国以来开垦所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本文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并指出原因,同时给出了消除负面效应的具体措施。这些都对于目前我国所提倡的可持续发展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面对困境应转变价值观念、确立生态价值观,传统的畜牧业应走向工业化的道路,向现代化过渡。在退耕还草的基础上要充分利用水资源,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第二、三产业,减轻农牧地区的人口压力,提高人员素质,最终实现农牧区的科学发展。

关键词: 兴安盟, 开垦, 草原, 畜牧业

ABSTRA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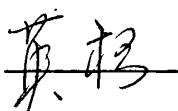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untry, Xing-an League carried out a large-scale of cultivations. The dynamic change of cultivated land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in Xing-an League area is very similar to the rise and fall of cultivation and the changes of the arable land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and there were four Reclamation climax as follows: the economic recovery period, Difficult three-year period、 the period of ten turbulence and the period continuing to this da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Cultivation have the reasons for its long-term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oots, among witch policies and systems are one of motive power, population expansion in pastoral areas, “value for agriculture superior to animal husbandry”, large-scale cultivation had negative effects on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environment. Reclamation resulted directly in the deterioration of cultivated grassland; the damage to grassland is devastating. Lot of natural disaster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uman damages to the grassland ecological system, and these damages resulted in drought, dust storms and frequent occurrence of other natural disasters, and more seriously lead damage to biodiversity. In particular, resulted in the scene of “advance agriculture, retreat animal husbandry”, “advance sand, retreat grass”, lead a lot of farmers and herders to lose their basic space of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increased the conflicts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brought about a gradual impoverishment of peasants and herdsm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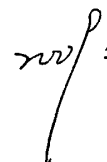
To Summarize and find out the reasons for the negative impact brought about by the cultivation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country, and to give the specific measures for the elimination of the negative effect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now. First of all, changing values、 establishing ecological values, traditional animal husbandry should be set on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transition to the modernization. On the basis of “revert cultivated land to grassland” policy, make full use of water resources, adjus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 the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reduce the population pressure on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area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KEY WORDS: Xing-an League, Cultivation, Grassland, Animal Husbandry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本人为获得内蒙古师范大学或其它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感谢。

签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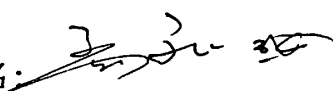
日期:  年 6 月 25 日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内蒙古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内蒙古师范大学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并且本人电子文档的内容和纸质论文的内容相一致。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也遵守此规定。

签名: 

导师签名: 

日期: 2009 年 6 月 25 日

前 言

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 举国上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有些地区甚至达到了小康水平, 而兴安盟地区经济却还停留于贫困落后的状态。兴安盟地区虽有一定的资源优势和中央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优惠政策和财政上的支持, 但仍处在贫困落后之中。造成现状有主客观两方面原因, 客观方面, 兴安盟缺少大的厂矿、企业。主观方面, 兴安盟经济发展指导思想有一定偏差, 导致其地区经济仍不发达。

“上地利用反映了人与自然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最直接、最密切的关系。”^[1] 无论是农业还是牧业, 都是以土地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物质基础, 有了土地才可能有庄稼和牧草, 因而争夺土地便成了农牧矛盾的最大焦点, 且成为了草原生态破坏的缘由。“这个矛盾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渐化解, 使游牧生态文化中融入农耕文化的内容, 开阔了视野, 展示了博大精深的内涵,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 草原本身的地理环境, 气候变化雨水阳光的条件, 基本上不适于农业, 可是历史上违背自然规律, 按照主观愿望, 不断地开垦侵袭牧业, 破坏了草原生态的游牧业, 使它遇到了生存危机。”^[2]

建国以来兴安盟地区的大面积土地开垦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加剧了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 迫使牧民失去生存空间, 加大了农牧矛盾, 逐渐走向了贫困化。开垦所导致的草原荒漠化直接威胁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草原荒漠化、退沙化的问题上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出發, 有着不同的观点, 大部分人认为超载过牧或人口膨胀是导致草原生态恶化的直接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 大面积土地开垦是导致兴安盟地区草原生态破坏的最直接原因, 而开垦受人口膨胀、政策制度、价值观念等的影响。

土地开垦必有它的好处, 增加耕田, 农牧民甚至国家会有多一份收入来源, 但这对于蒙古高原的少数民族地区来说只是短期的利益。本文将分析大面积的土地开垦对兴安盟地区造成的负面效应, 从哲学的角度总结并进行反思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特性, 以因地制宜的方法、一分为二的观点、人类主观能动性将符合客观规律的真理得出结论, 并试着总结出一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具体措施。

一、建国以来兴安盟地区大面积土地开垦

（一）兴安盟地区自然环境

兴安盟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雨水条件。其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大兴安岭中段，地面不是很平坦，以丘陵多闻名，全年干旱天气较多，气候条件决定了一年一熟的农业生产农耕轮作制。裸露的地表只有在四、五月到七、八月这短短的四个月左右时间是被绿色植物披盖，其他时间是以松软的活土形式存在着，干旱、多风、雨水少等自然条件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1. 兴安盟概况

兴安盟属于内蒙古自治区 12 个盟、市之一，地处大兴安岭中段而得名。“兴安”，满语，汉语意为“丘陵”。因大兴安岭山势较缓，主脉山峰相对高度亦不甚大，故满语称之为“兴安”。全盟辖 65 个乡镇苏木级单位，生活着蒙古、汉、满、朝鲜、回等 22 个民族共有 163 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52.8 万人，蒙古族人口占全盟人口的 43%，是全自治区蒙古族人口比例最高的盟市。^[1]兴安盟的历史沿革较复杂。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行政化分区曾隶属过如今的通辽市和呼伦贝尔市。1949 年 12 月 2 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改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月，兴安盟政府改称兴安盟人民政府；1953 年 2 月，在乌兰浩特市成立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区行政公署，1954 年 5 月撤销内蒙古自治区东部行政公署，科右前旗、科右中旗、扎赉特旗、突泉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今呼伦贝尔市）管辖。1965 年 10 月，科右中旗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今通辽市）管辖。^[4]1980 年 7 月 26 日，国务院批准恢复兴安盟建制，1996 年 6 月批准设立阿尔山市，隶属兴安盟。从 2005 年至今，兴安盟辖乌兰浩特市、阿尔山市、科右前旗、科右中旗、扎赉特旗、突泉县等 6 个旗、县、市。所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兴安盟历史包括人口迁移、畜牧业发展的状况、草原的变迁、开垦的原因等问题与内蒙古其他几个邻居盟、市的历史沿革有密切联系。

2. 地理地貌特征

兴安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大兴安岭中段。地理坐标北纬 $44^{\circ}14' \sim 47^{\circ}39'$ 、东经 $119^{\circ}28' \sim 123^{\circ}38'$ 之间。西北、北与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鄂温克族自治旗、扎兰屯市接壤，东北、东与黑龙江省龙江县、泰来县毗邻，东南与吉林省镇赉县、白城市洮北区、洮南市、通榆县相连，南、西南与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霍林郭勒市、扎鲁特旗，锡林郭勒盟的东乌珠穆沁旗和蒙古国的东方省交界。总面积 59 806 平方公里，占内蒙古自治区总面积的 5.06%。处在东北亚经济圈内，是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建设第四条欧亚大陆桥的纽带。兴安盟地势呈西北高、东南低。大兴安岭山脉中段从西部穿过，西侧缓缓倾斜，逐渐过渡到内蒙古草原。东侧呈阶梯状下降，直至松辽平原。山坡较为陡峻，地面切割强烈，地形较破碎。兴安盟地貌为中低山丘陵地貌。山地面积约占全盟总面积的 90%，海拔高度 150—1800 米。山体主要由海西期花岗岩和中生代火山岩，火山碎屑岩及新生代玄武岩组成。火山岩裸露，受侵蚀作用，形成明显断块侵蚀地形。境内平原为嫩江西岸平原，面积约占全盟总面积的 10%，分布在东部和南部边缘。南部平原区内，分布着少量风成沙池。^[5]

3. 主要土壤类型

全盟土壤复杂，土壤类型和土被结构呈多样性。可划分为暗棕壤、灰色森林、棕色针叶林土、黑土、黑钙土、草甸土、栗钙土、风沙土、粗骨土、石质土、沼泽土、盐土等 12 个土类。其中宜于农业利用的土壤资源类型只有黑土、黑钙土、栗钙土、草甸土、沼泽土等 5 类土，主要分布在海拔 300 米以上的丘陵、平原地带。而适合农业生产的这 5 类土的面积很小，还不到总土地面积的一半，所占比例分别为：黑土占 3.47%，黑钙土占 15.26%，草甸土占 15.66%，栗钙土占 13.15%，沼泽土占 3.26%。^[6]土壤特性表明，兴安盟地区不适于耕种大量的农作物。

4. 气候特征

兴安盟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由于地理位置纬度高，大兴安岭主脉以东北—西南向纵贯盟境西北部，使全盟地势从东南向西北抬升，形成明显的立体气候特征。盟内各地气候差异较大，从北向南，日照、积温、无霜期递增，降水递减。春季降水少，大风多，蒸发大，湿度小，干旱频率高。大多地区大风日数平均 20 天以上，蒸发量 600~800 毫米，冷暖空气活动频繁，春霜结束较晚，时有发生“倒春寒”。夏季温热短促、雨水集中、旱涝均有发生，西北部林区春秋相连，没有夏季。秋季降温快、初霜早，冷空气活动增多，加之地面辐射冷却作用，气温急剧下降。冬季漫长寒冷，阿尔山地区寒季长达 7 个月，其余大部分地区 5~6 个月。1 月份最冷，平均气温 -25.6℃，阿尔山地区最低温达 -45.7℃。

正因为这种特殊的草原地理环境、气候变化、阳光雨水条件决定了得益于游牧为主的生产方式的产业选择。几千年来，这片土地养育了以游牧为生的游牧民族，但到了近现代，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却开垦大面积的土地，带来了诸多不良后果。

（二）开垦状况

兴安盟种植业开发较晚，清咸丰元年（1851）才开始开荒种田，当时耕地面积很

小。到了民国时期,关内汉族农民不断涌入兴安盟地区,买荒地垦殖或租种他人土地,土地开垦因此不断扩大。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各级党委和政府广泛号召农牧民发展农业生产,大面积的草原和牧场逐渐被开垦和利用,使牧场面积不断萎缩,严重影响了畜牧业的发展。虽然农业开发较晚,可在短短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却开垦了大量优质草原,引发了很多社会和生态问题。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随着向草原的开发与垦殖,兴安盟总耕地面积有较大的起落。兴安盟耕地面积的动态变化及其趋势特征与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来垦荒活动的兴衰和自治区耕地面积变化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内蒙古曾经有过(或正在持续)四次垦荒高潮,各出现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十年动乱时期(1966—1976)和始于 1980 年代末期并持续至今的第四个高峰期。”^[7]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兴安盟各级党委和政府广泛号召广大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经过土地改革,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和房屋,有了自己的牲畜和农具,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发展农业生产,支援国家建设,已成为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各地农民大面积开荒,种粮种豆,使耕地面积有了大幅度增长,到 1950 底全盟耕地总面积达 507.2 万亩。随着生产的发展,开荒种田仍呈增长势头。到 1954 年底,全盟耕地总面积达 588.2 万亩。短短的五年内开垦了 200 多万亩。耕地面积的急剧增加,而生产工具落后,劳力不足,使耕作变得十分粗放,多数地区广种薄收,造成土地沙化和退化。有些地方还开垦了草原和牧场,使牧场面积不断萎缩,影响了畜牧业的发展。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 10 年时间里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和“牧民不吃亏心粮”,大量开垦草原种植粮食。另外,在牧区以建设饲料基地为名也开垦了大面积草原。在此期间,还有众多的建设兵团、部队、厂矿、企业单位也陆续到牧区强占、瓜分和开垦草原。十年动乱结束以后,各级政府果断采取措施,发文件,出告示,禁止扩大开荒,并规定对一些坡度较大的坡耕地迅速还林还牧,大面积开荒从此得到控制。到 1980 年全盟耕地总面积基本稳定在 550 万亩左右。改革开放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高生活水平,追求最高经济利益已成为了普遍现象。自 1986 年起,全盟范围内开发水田,使一些近河低洼易涝地得到治理和开发,耕地面积又有了大幅度增长。到 1990 年全盟共开发水田 21 万余亩,耕地总面积增加到 616.56 万亩,约占土地总面积的 6.8%。1993 年开发水田 29 万亩,1995 年开发 22.3 万亩。1995 年末全盟总耕地面积达 656.94 万亩,比 1980 年增加 77.69 万亩,耕地总面积占全盟

总土地面积的 7.23%。^[8]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为了迎合国家农业开发宗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开垦高潮。1996 年,全盟土地详查总面积 55 524.29 平方公里,折合 5 552 429.38 公顷。其中农用地面积达到了 5 018 164.29 公顷。在农用地中,耕地 716 070.46 公顷。2000 年,全盟土地详查总面积 5 552 429.38 公顷,其中农用地面积 4 952 347.99 公顷。农用地中,耕地 663 428.12 公顷。2005 年,全盟土地详查总面积 55 524.29 平方公里,折合 5 552 429.38 公顷,农用地 4 848 331.93 公顷,其中耕地 730 022.49 公顷。^[9]

1996~2005 年,全盟逐年增加总耕地面积。2000 年,全盟总耕地面积比 1996 年增长 44.21%,2005 年,全盟总耕地面积比 2001 年增长 6.63%。^[10]

(三) 开垦原因

1. 政策制度的影响

政策决策和管理制度对土地开垦活动和草原生态的影响是最根本最直接的。回顾兴安盟牧区的生产活动、经济发展与草原生态变化、草原大面积荒漠化和牧区生活水平变化无不与政策制度有关。例如自清末推行“新政”到 20 世纪末的 100 多年中的屯田和“移民实边”政策,再到民国时期的军队屯垦,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以粮为纲”、“牧民不吃亏心粮”、生产兵团和国营农场的大量建设、1985 年颁布的《草原法》具体实施力度的不足等都是草原大面积土地开垦的重要原因。

建国以来草原的开发、垦殖政策制度有一个漫长的发展历史过程,以致延续到了现代。了解兴安盟建国以来开垦状况要从历史根源说起。清朝中期以前,兴安盟地区属封禁地,各旗领地有严格的地界,彼此不得侵越,明确规定不得垦殖、典押、买卖和招佃,更不允许外地蒙民和汉民进入旗地开垦草原和荒地。到了 19 世纪末,兴安盟地区开始逐渐地被开垦。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对草原解禁官放,外旗县的汉农民大量涌入兴安盟地区,他们在这里开荒种地或租田耕种。这个时候的农民根本没有自主权,开垦 100 垧荒地,交压银 2 两。^[11]在民国时期,因战争需要,屯垦军来到兴安盟地区,逼迫农民种田满足他们的需求。北洋政府在制定政策、方针后,对内蒙古境内各地方开始了新的更大规模的放垦蒙地土地活动,“垦地日广,牧场益狭……蒙官权力渐失,蒙民之生计日蹙”,这期间,兴安盟地区的农牧民再次遭受了深重劫难。^[12]

1947 年 10 月,《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土地改革使广大贫下中农翻身做了主

人。这个时候的农民积极性和阶级觉悟空前高涨，就 1949 年的一年时间里全盟共开垦了 15 万亩草原。^[13]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和各级党委广泛号召、鼓励广大农牧民发展农业生产，尤其是经过土地改革，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和房屋，有了自己的牲畜和农具，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并且由于急于致富加速了开垦活动。此时，发展生产，支援国家建设，已成了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各地农民开始大面积开荒。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以后，就着手成立国营农牧场，其中最为代表性的是兴安盟科右中旗吐列毛杜农场。其建于 1960 年，总土地面积 120 万亩，1995 年的数据统计其中开垦耕地面积为 9.5 万亩，草原 65 万亩。该农场后来通过个人承包，陆续地被开垦，草原面积在不断地缩小。

“解放后，内蒙古土地政策主要划分两个时期。前期内蒙古土地政策仍实施放垦为主的政策，后期正式推行禁止政策。解放以来虽然制定了相关禁垦政策，总的看开垦政策还是占了上风。”^[14] 在这个时期兴安盟的开垦面积一直持续上升，1950—1978 年，内蒙古土地政策长期受到极左路线的干扰，特别是在 1958 年以后的 20 年间，受到的影响更大。政策上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牧区号召“大办农业，牧民不吃亏心粮”，大办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使草原资源受到严重破坏。“调查表明，1958 年后全区滥垦草原 247 万余公顷，其中十年动乱期间就达 93 万多公顷。”^[15] 这个期间，兴安盟地区共开垦了将近 130 万亩优质草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极左路线对内蒙古土地政策的干扰已经结束。土地、草原的价值进一步被肯定，实行了以法保护、禁止开垦的政策。先后出台了一批保护土地和草原资源的政策，如：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内蒙古草原管理条例》等，从此土地受到了法律的保护，盲目地大规模开垦土地的活动受到限制。尽管如此，违法开垦草原事件时有发生，零星分散开垦仍然存在。“据统计，近年来全区每年发生破坏草原案件 2500 起以上。”^[16] 兴安盟也不例外，以开发农业、旅游业为理由，不断地侵入草原，开垦大量草原牧场的现象仍普遍存在。

2. “重农轻牧”价值观的影响

造成如今大规模的开垦现状，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主要表现在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中所持有的不同价值观念上。“由于这种农耕价值观在包括近半个世纪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扮演了主导文化角色，古代的‘主谷制’、‘屯田制’才得以演变到现代的‘以粮为纲’和建设兵团等。”^[17] 因不同经济基础上建立的价值观念的不同，农耕民族始终有轻视“游牧、畜牧业”的倾向。在这种农耕价值观主导

文化角色的统领下，从古代的“主谷制”、“屯田制”演变到了近代的“借地养民”“移民实边”和建国以来的“以粮为纲”、“牧民不吃亏心粮”、“生产建设兵团”等，这些口号的提出，就是最好的见证。

“游牧民族在他们自身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社会文化类型。对此，人们不应认为是粗俗、落后和停止不前的。”^[18]农耕民族对此持有否认态度，认为北方游牧民族是落后民族，这是中原汉族根深蒂固的观念。对农耕民族来讲越是水草丰美、优质的草原越是有开垦价值，不开垦就没有价值可言。移居草原的农耕民族以大量开发利用草原为前提，在草原上安居乐业。而农耕民族在长期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中没有“草地”概念，更是不理解游牧民族对草的依赖及“草”的价值。汉语里所带“草”字的词语都函有贬义或负面意义，例如：草寇、草率、斩草除根、草菅人命等等。自古至今，“农耕先进 游牧落后”的思想观念一直束缚人们的思想行为。

对历代的统治者的开垦行动进行分析，不难理解这一点。清代从顺治元年至光绪早期的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内蒙古少数民族地区禁垦政策与放垦政策的相互交织，最终放垦政策还是扮演了主导角色。到了光绪晚期 1902 年开始，清廷彻底放弃禁垦蒙地政策，全面推行放垦政策，推行了所谓“借地养”、“移民实边”的新政策。首先开垦内蒙古西部地区伊克昭盟和乌兰察布两地，之后放垦东部区。理藩院左丞姚锡光上奏光绪，要求放垦内蒙古东部：“内外蒙古，…民俗劲悍，此尤根本之根本。….当经营内外蒙古荒地，宜及时采东西殖之策，用晃错实边之谋，….招民垦种….昭乌达、哲里木二盟之巴林、达尔汗各旗，未垦荒地纵横方数千里，….尚可开地数十万顷。”^[19]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农耕移民就这样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草原开垦活动。民国时期，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都主张推行开垦政策。“北洋军阀执政仅 15 年期间就放肯土地 17837 顷（11.89 万公顷）。 ”^[20]国民党执政时期，借口“蒙古为日俄侵略之对象，其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各种侵略之事实，恐怕内蒙亦将为外蒙之续。”^[21]通过在兴安盟地区改盟设县，扩大县治区域，强迫蒙旗报垦，推行其蒙地开垦政策，开始了新一轮的掠夺草原资源的高潮。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对草原价值的错误观念还是被继承了下来，从而一直在发挥着它的作用。

对于草原这样的一个宝贵的国土资源，直到 1985 年才出台了专门的“草原法”。1978 年 3 月 5 日颁布施行的第三部宪法，把国土资源仅分为“矿藏，水流，国有的森林、荒地、其它海陆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从这一点能看出显然是把草原当成荒地来看待的。那么，荒地对于农耕民族而言，是没有开发利用的、没有体现价值的土地而已。在这种价值观念的带动下，建国以来，还是没有很好的处理土地利用和草

原资源保护的矛盾问题。从 1985 年出台“草原法”以后出现的第四次开垦高潮可以看出,“草原法”的实施情况与力度是可想而知的,也能看出对草原的重视程度还是不够的,有待加强。

1985 年虽然出台了《草原法》,但实际上,在法律和政策两个层面上有出入。“例如:《草原法》把荒漠地或半荒漠地作为恢复植被后的‘未来的草原’,但是在《农业法》中却被作为‘四荒’,即被当作开垦对象。这一点在政策层面上表现为环境保护与通过扩大耕地面积来增产粮食的政策之间的矛盾。”^[22]

“解放后提出和实施的“定居化”政策,虽在吸收定居文明长处方面有可取之处,但把牧区的贫穷落后统统归于游牧生活造成,进而做出在两个五年计划内使牧区完全定居化的决策。”^[23]从本质上讲,这也是“农业先进,牧业落后”传统思想的外沿。

3. 人口膨胀的影响

民以食为天,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根本物质条件。土地对人类的承载力受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水平、生产力和自然条件的制约。作为消费者,人口越多消费就越多,对国民经济和自然资源环境的压力就越大。

建国以来,大量外地农民涌入兴安盟地区。牧区农耕人口占绝对优势的格局成为蚕食草原的主要力量。由于人口的增加,对粮食等生活资料需求量也就增加,于是毁草种粮供给制度也就应运而生。在增加的人口汉族居多,而汉族是以农耕文化为主导的民族,他们勤于耕作,也就加剧了草原的开垦。人口的大量增加,加大了人类对土地资源的索求与压力,造成兴安盟地区甚至内蒙古土地被过度滥垦。另外,迁入兴安盟地区的人员大多数是内地的贫苦农民,他们不熟牧业,也不了解当地的自然环境,只能以开垦土地来作生为活保障。这种认识的局限性,只会带来开垦更多草原局面不断加剧,久而久之,破坏了北方地区草原生态平衡。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兴安盟总人口为 471 724 人,1954 年兴安盟撤销时,境内总人口达到了 567 301 人,到了 1980 年底,全盟总人口为 1 328125 人,26 年间净增人口 760 824 人,增长 174.56%,平均每年增加 29 262 人。这是兴安盟历史上人口增长最快时期,也是耕地面积迅速扩大的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加,全盟逐年增加总耕地面积。2000 年,全盟总耕地面积比 1996 年增长 44.21%,人均占有耕地 0.4018 公顷,增加 0.1196 公顷,增长 42.38%;2005 年,全盟总耕地面积比 2001 年增长 6.63%,速度明显放缓;人均占有耕地 0.4233 公顷,增加 0.0211 公顷,增长 5.25%。^[24]随着人类活动的强度加大、人口的不断增长,人们在有限的自然资源上为了生存,只能获取基本的能量与食品,使单位面积上的土地压力加大,在经济基础水平较低的

情况下,也只能靠扩大耕地或增加牲畜数量的办法来满足农牧民日以增长的需求。于是,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开垦也就逐渐增加。

“随着内蒙古地区农业人口的非自然增长,草场的迅速萎缩,促使草原人口密度的加大,引起人口的相对过剩,进而引起牲畜的过剩……进而引发草原的严重沙化、荒漠化和广大农牧民生产生活水平的下降甚至贫苦化的重要原因之一”^[25]由于人口的增加,生存的需要,人们向土地索取会进一步加剧。尽管改革开放 30 年的发展过程中兴安盟农牧业发展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主要是扩大耕地面积、掠夺草原的结果,是以牺牲草原资源而换取目前利益为巨大代价的。而这种利益不但维持时间不长,长期一来会带来草原生态危机。开垦是导致草原退沙化、生态恶化、农牧区贫困化、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最直接的主要原因。然而,农牧区人口的增多又是垦荒的驱动力。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农耕人口的迅速增加导致了草原大规模开垦。

人口短期内急剧增长,导致土地被无序不合理地过量开垦。对人口增长带来的耕地问题,用破坏生态环境,造成不易估计的代价——开垦草原牧场来解决。虽然解决了眼前的矛盾,满足了近期的经济利益,但失去了长远的利益。有待开发的宜耕土地面积是有限的,单靠增加耕地面积来提高农牧民生活水平、提高地方财政收入是不可取的,是没有潜力的、不明智的、自寻短见的选择。

兴安盟正处于农牧交错地带,故几千年来一直是传统牧业区。牧业区单位面积土地对人类的承载力,除受到该地区自然条件的制约,还受到相应历史时期该地区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正常情况下逐渐形成土地和人类相协调的平衡。当人口短期内非正常急剧增长,必然打破这种人与自然的平衡与和谐,构成对土地最直接的破坏。兴安盟地区自建国以来,恰恰破坏了这种平衡,违反了自然规律,给该地区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

4. 开垦的其它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高生活水平,追求最高经济利益已成为了全盟上上下下普遍现象。在这样的动力之下,由于为了获取转包利益、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提高职工福利等原因,地方政府也进行了大量开垦。

有些地区是以招商引资、经济开发为幌子,进行大面积开垦。也有些单位、部门、公司,个人通过各种手段和渠道,取得草原开垦批准书后转租给其它外地或个人进行开垦,从中获得利润。例如:在 20 世纪 80 年代,牧民领取到了《草场使用证》,说明依法具有了使用和保护草场的权利和义务。可由于有些单位与个人完全无视《草原法》与牧民的合法权益,再加上牧民汉语水平差、法律意识弱,很容易让别人侵占牧

民承包的草场办厂、开矿和垦荒。

除了以上原因之外,道路也占开垦草原的一部分,例如省际通道占的都是草原。由于修建道路而占用的耕地面积,并不是以开垦另一片草原而付出代价的,相关部门应该按有关规定折合成补贴资金,这样可以鼓励受损失的农牧民投入到第二,三产业当中。科尔沁右翼中旗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2003 年 3 号文件的第六条内容上明确写到“关于省际通道占用巴彦胡舒镇的 930 亩耕地事宜。按照土地管理和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征用土地的有关规定,本着动态平衡、占一补一的原则,责成科右中旗巴彦胡舒镇政府和国土资源局在踏查核实的基础上,从土地后备资源中调整适中的相应面积地块,按程序审批后予以补充耕地,交通部门负责按有关规定从征地补偿金中解决补充耕地开地资金,尽快给农牧民落实耕地。”像科右中旗这样生态环境脆弱区应该严格控制再开垦土地,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毁坏林地、草地,污染水资源,浪费土地,对生态环境敏感区域要分级设立重点预防监督区。对不适宜生产和生活的地区,要作出规划,创造条件,实行异地开发和安置。

另外是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建水库、大的工程、煤矿开采等,还有农业开发。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还是针对发展农业为主的农业开垦。国家农业开发宗旨本来是针对低产涝洼地改造,而兴安盟地区还是一概而论,对现有的优质草原进行农业开发,因为兴安盟实际上现有的就是草原,而且是优质的草场。下面主要分析农业开垦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二、开垦造成的负面效应

人的主观能动性应遵循客观规律,不然不仅以失败而告终且会反遭报复。世界上的任何现象都有产生的原因,任何原因都必然引起一定的结果,事物或现象之间总有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恩格斯在针对美索不达米亚、希腊、阿尔卑斯山以及小亚西亚的意大利人想得到耕地而破坏森林所遭受到的惩罚时,曾经从哲学角度总结说道:“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结果。但第二步和第三步都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取消了。”^[26]

建国以来的兴安盟地区农业开发过程中也同样存在着类似问题,如今恩格斯的话语又一次被证实了。兴安盟地区是科尔沁大草原的重要组成部分,曾以水草丰美而闻名于世的科尔沁草原,经过清代以来的大规模农垦,逐渐变成了科尔沁沙漠带,形成了半农半牧的经济结构。人为因素对兴安盟地区的自然环境的恶化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大面积土地开垦,不仅对农牧民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更是

阻碍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又快又好发展，加剧了农业与牧业的矛盾。盲目地向土地、草地、沙地要粮，从而使地表的植被遭到了严重破坏，进而导致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和土地的沙漠化。而严重的水土流失和土地的沙漠化不仅剥夺了牧民的切身利益，也使得广大的农牧民越来越贫困。恶劣气候频繁出现尤其是沙尘暴的侵袭，最终也导致农业生产的衰落，更为严重的是威胁到了动植物的多样性。垦荒的结果造成了草原面积缩小，生态环境更趋恶化，农田被白沙侵吞，也导致了“农业吃牧业、风沙吃农业”的恶性循环。

（一）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垦荒是对天然植被破坏最严重的一种形式，它对植被和地被破坏是及其迅速和毁灭性的，垦荒造成的植被破坏在短期内很难恢复。垦荒不但破坏了植被使草原面积缩小，而且土壤失去植被的保护作用，加上土壤的沙质特性，在干旱风季，土壤表层开始风蚀沙化，为土壤沙漠化的发展打开了缺口。”^[27]垦荒不仅破坏了草原植被，更是使草原面积缩小，且土壤失去植被的保护作用。兴安盟属于自然灾害最多、发灾频率最高、受灾面积最大的少数民族地区之一，在发生的很多自然灾害中，许多灾害都与人类破坏草原生态密切相关，结果导致干旱、沙尘暴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1. 草原荒漠化

近年来兴安盟草原的退沙化、荒漠化越来越严重。“据有关专家研究，我国草原沙化面积的 25.4%来源于盲目开垦草原和撂荒。”^[28]众多科学家研究及经验已证实了草原退化的主要的因素—开垦。

“一般认为开垦一亩草地，将沙化三亩草原。”^[29]草原开垦的主要原因无非是想满足粮食的需求与短期的经济利益，但却影响着整个人类生活环境的安全，甚至会影响到子孙后代的生态安全、经济生活水平和生活最基本的物质来源。自古以来，草原大面积垦荒都以失败而告终，其根本原因在于违背了大自然的发展规律。人的主观能动性必须符合客观规律，否则会必然受到惩罚。草原开垦与草原退化、沙化之间有因果的内在联系。垦荒是破坏天然草原植被的直接手段，对草原植被、地被的破坏是毁灭性的，短期内很难恢复。就算是通过人工草原生态重建及恢复，情况会有所好转，但远不及开垦前的天然植被。兴安盟地区开垦的地方大多数都处河流水系上游或发源地，开垦后草原植被失去作用，加大了水分蒸发，雨多时水土流失，雨少时再加上强烈蒸腾作用，会径流减少，甚至会湖泊干旱、河流断流、庄稼干枯。

在兴安盟，甚至整个内蒙古，大面积草原表面大多覆盖着薄薄一层土，下面就是沙石，根本不适宜种庄稼，一旦开垦草原极易陷入开垦—撂荒—沙化的恶性循环中。几千

年的历史已经确确实实证明了草原开垦的最终结果是一草原退沙化、荒漠化、草原植被严重受损的道理。开垦后造成的景象便是“人造沙漠”。

建国以来的短短三十年当中,兴安盟科右中旗在原先没有沙漠的地方,已经出现了大范围的流沙堆积,其中有些苏木、乡以“沙漠”的内容来命名,如:巴彦茫哈、茫汗艾里等,这里所说的“茫哈、茫汗”在汉语上是指“沙子”。大兴安岭脚下的嫩江曾是森林和草原的分界线,嫩江流域曾分布着广袤的疏林草原,新中国成立后因过度开荒种地,不仅使大片的疏林草原垦为耕地,而且大兴安岭林缘也向东北方向退缩。

“目前,我国北方的沙化土地中 25.14%是因草原过度农垦引起的。专家指出,我国北方的 3 亿多公顷草原中,丰美的草原只剩下 0.4 亿公顷,而这 0.4 亿公顷草原目前还在被开垦。”^[30]而兴安盟正处在东北亚经济圈内,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建设第四条欧亚大陆桥的纽带。

兴安盟草原基本情况是草原面积逐渐减少及草原退化,调查显示:20 世纪 60 年代全盟有 6000 多万亩草场,可利用面积达到 5527 万亩。80 年代,草原面积减少到 4551 万亩,可利用草原面积 3918 万亩,就 20 年时间减少了 2000 多万亩,减少率达 33%多,平均每年减少 116.95 万亩。90 年代全区实行草原承包,落实草原“双权”,草原面积减少到 3192 万亩,可利用草原面积减少到 2795 万亩,1985—1998 年减少了 1359 万亩,减少率 20.9%,平均每年减少 104.5 万亩。兴安盟草原退化,主要表现在草原生产力下降,亩产草量退化,植被覆盖度降低。60 年代,干草产量每亩达到 171 公斤,营养价值也高,牲畜喜欢吃的草占到 60%。到了 80 年代,草原质量已经下降,每亩产干草到了 151 公斤,每亩平均降低 20 公斤,营养价值和牲畜喜食的草下降 40%。^[31]

一直以来,人们总是通过开垦天然草地(即草地垦荒)而扩大耕地种植面积,国内也主要靠开垦草地来不断地扩大耕地面积。尤其在少数民族地区,政府更是“以粮为刚、牧民不吃亏心粮”等理由鼓励广大农牧民大量开垦种粮食,结果兴安盟地区出现了大面积草原沙化区。例如调查显示:科尔沁右翼中旗流动沙地面积 0.33 万公顷、沙化草场 7.5 万公顷、沙化农田 8.04 万公顷、盐碱地 9.22 万公顷、水蚀地 3.56 万公顷,荒漠化面积达到了 28.65 万公顷,占总面积的 40.86%。^[32]

草原开垦与草原荒漠化有必然的内在联系,草原开垦是草原荒漠化的催化剂、是“罪魁祸首”。从上面数字可以看出,为了满足眼前的耕地“开发者”有限的利益,让草原植被付出如此沉痛的代价是得不偿失的短视行为。

2. 气候变化

有这样一个寓言：沙尘暴一来，顿时满目飞沙，遮天蔽日，狂烈的风挟着沙粒卷来卷去，将房屋扑倒掩住，将庄稼、家畜甚至人的生命无情夺走。人们忍无可忍派代表到天帝控告沙尘暴。那人找到天帝哭诉道：“我简直没法活，沙尘暴为所欲为，一直揪住我不放，我到哪儿它追到哪儿，而且把我往死里整。”于是，天帝传沙尘暴受审，沙尘暴一一承认那人说的话，天帝发怒追问是受何人指使干的，沙尘暴说：“是眼前这个人让我干的，我浑身沙粒原本安睡在成片树林和丰美的草原之下，那可是我的安身之所、是诗情画意般的生活，可是，他带头砍伐大树，开垦草原，风刮来，我的沙被高扬，沙粒随风飘走，我成了沙尘暴，沿着他的足迹，有时还追赶不上，没有了安身之所，我的名声是越来越遭，可我的苦向谁诉？谁料到这制造我的人，却来恶人先告状！”等天帝回过神来，那人早已跑得无影无踪。

大量的草原开垦，导致了土壤疏松、植被破坏。土地开垦、草原退沙化、沙尘暴三者之间也有着内在的联系，大面积土地开垦和草原开垦导致土质疏松、地表裸露、草原退沙化、荒漠化，而退沙化、荒漠化的草原则成了沙尘暴的发源地。“翻耕后风蚀量一般达未翻耕土地风蚀量的 14.8 倍，因此，开垦是扰动地面使其成为新沙尘源的主要形式。”^[33]沙尘天气有两种表现形式：扬沙和沙尘暴。“扬沙是指因风大将地面尘沙吹起，使空气相当混浊，水平能见度在 1 km 至 10 km 以内。沙尘暴是指因强风将地面大量尘沙吹起，空气非常混浊，水平能见度小于 1 km。”^[34]从两者的危害比较沙尘暴天气的危害远比扬沙天气的危害大。沙尘暴的发生次数在春季为最多，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个季节兴安盟地区冷空气活动频繁，大风天气的出现率高，降水少。二是这个时节地表裸露、土壤疏松，为沙尘暴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建国以来兴安盟地区多次出现扬沙天气和沙尘天气，每年的平均气温也有逐渐增高的趋势。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兴安盟地区风沙天气的出现率最高，随着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这种天气可以说是一种灾害性天气。在 1993 年北方地区发生了黑风暴天气以后众多学者与领导人开始广泛关注，从不同角度分析总结出现风沙天气的原因，有些人认为这是大自然本身的规律，大自然本身运动的必然结果，也有些人认为这与人类的行为有密不可分的直接联系。当然，要说到“人为”所造成的结果，也分很多种原因。开垦不仅使草原地区植被遭破坏，地表裸露，且增大了水分蒸发，雨多成水患，水土流失，更是造成大风日增多，裸露的表土和沙尘随风而起，形成扬沙或沙尘暴天气。我国“1949 年建国以来的半个世纪，每 10 年间强和特强沙尘暴频数的年际变化是：50 年代发生 5 次，60 年代发生 8 次，70 年代发生 13 次，80 年代发生 14 次，90 年代至今达到最高峰，仅 2000 年 3-5 月份就有 15 次之多，是近几十年罕见的。”^[35]

其中内蒙古兴安盟地区 60 年代发生了 10~11 级的特强沙尘暴一次, 70 年代 2 次, 80 年代 3 次。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 发生沙尘暴的频率在增加。1999 年 6 月 28 日, 兴安盟科右中旗境北部坤都冷、吐列毛杜、额木庭高勒等苏木镇发生强沙尘暴, 当地人介绍说: 仅额木庭高勒苏木五星嘎查就有 20 余棵大树被大风刮断, 野兔在沙尘暴中迷失方向, 跑到村子里被村民抓获。

由于盲目开垦, 使草原日益退化, 给草原提供水资源的湖泊和河流逐渐消失, 绿地逐渐变成黑土地, 吸收太阳能量大量加大, 增加了地温并向大气辐射, 造成气温升高, 水分挥发, 春秋季节风大, 由此造成进一步干旱天气。

3. 对野生动植物的影响

“草原退化是牧区荒漠化的主要形式, 由于草原是牧区最大的承载体, 也是牧区环境的组成部分, 又是生态系统的第一生产者, 它与环境 and 动物存在密切的联系。因此, 草原退化将影响以草原为生存环境和食物来源的动物, 也要影响到牧区环境。”^[36]因过度开垦、过度开采等人为因素造成了野生动植物资源的数量、种类、多样性等逐渐减少, 从而暴露了生态环境脆弱的问题。

兴安盟野生植物分为森林资源、草场资源和其它各类植物资源。兴安盟原本草场资源丰富, 以草甸草场为主, 其次为林间草场的地区。全盟 80 年代初天然草场不包括林间草地就有 4551.14 万亩, 占全盟总面积的 50.73%, 其中可利用草原面积为 3918.26 万亩, 占草原总面积的 86.09%。^[37]草场植物、药用植物、野生纤维植物、野生油料植物、野生淀粉植物、山野菜珍品和可食用菌类及植物。近几十年来, 这些珍贵野生植物的种类及数量逐渐减少, 尤其是草场植物及药用植物的种类和数量受到一定的威胁。2006 年与 20 世纪 50 年代相比, 优质草牧场如羊草、冰草等在草群中的比例下降, 而一些适口性差的杂类草则增加; 草群变稀、变矮, 植物种类明显减少, 生物多样性减少程度大于其它任何自然生态系统。兴安盟曾经植物种类繁多, 建国初期有维管束植物 82 科、296 属、562 种, 其中蕨类植物 6 科、6 属、6 种; 裸子植物 75 科、288 属、553 种; 代表种类有羊草、老芒麦、贝加尔针茅、达乌里胡枝子、黄花苜蓿等; 药用植物有 91 科、417 种。但到了近十年, 却出现了因好多药用植物的短缺而从外地引进的现象。

“一般来说, 食物网越复杂, 生态系统就是越稳定。”^[38]因为食物网中某个环节(物种)缺失时其他相应环节能起补偿作用。相反, 食物网越简单, 则生态系统越不稳定。近半个多世纪的大量开垦严重打破了兴安盟地区的食物网。例如建国初期, 兴安盟境内有很多狼群, 由于人口的迅猛增长和大面积的土地开垦, 不到十年时间狼就

被消灭的差不多了。狼被消灭了，没有了天敌的鹿、羚羊等大量繁殖，超过林草的承载力，草地和森林遭到破坏、自身的竞争力下降，最后鹿群和羚羊等也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草虫鼠害加剧，破坏农田与牧场。每年大量农田遭受虫鼠害，农牧民运用大量农药来消灭虫鼠灾，这不仅增大了农业投入成本，而且还影响了绿色食品的生产。

“生物多样性所维护的生态平衡，对人类社会的启示是深刻的。人类在生物学意义上是统一的，但是在文化上是多样的，这种多样性是保证人类社会创造性和发展活力的基础，同时这种多样性也理应成为维护各民族共存共荣和平机制的基础。”^[39]从这个意义上讲，生物多样性的被破坏不仅是草原生态退化的表现，而且也威胁到了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

（二）对社会环境的影响

“生活在蒙古高原的蒙古民族等少数民族几千年来经营和发展游牧畜牧业，不是因为保守落后的结果，而是因为她们深刻认识自己周围自然地理环境的结果。蒙古高原的开垦史已雄辩地证明，蒙古高原是宜于畜牧而不宜垦种。”^[40]众所周知，认识论上的错误就是实践理念上的错误，这种错误导致的结果将是把实践引向歧途，给人带来难以挽回的后果。

1. 加大了农牧矛盾

开垦—草原荒漠化—自然灾害的加剧—野生动植物多样性的减少—农牧区贫困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一种原因—结果—原因的循环关系。“开垦”是这条循环关系中最关键的环节、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开垦所带来的直接结果是草原的荒漠化，而草原的荒漠化又是带来诸多不良后果的起因。兴安盟地区由于不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和天然草原，不仅破坏草原植被，使动植物种类逐渐减少，生物多样资源受到破坏，更是严重影响了当地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对整个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阻碍。

草原资源是漫长的地理变迁和生物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发展形成的，牧民世代生活在草原上，草原以博大的胸怀养育了草原民族，正是在这样的生活生产实践中创造了闻名于世的灿烂文化，使得草原人民得以生存和发展。草原是牧民的生产资料。牧民、牲畜和草原是草原生态的组成部分，牧民是利用草原这种天然资源，以畜牧业为生产方式的群体。而畜牧业是一种充分利用草原自然资源和畜群自然资源的产业。草原上的一切资源成为牧民的生命线。草原不仅仅是生产资源，也是他们的生命财富。有了丰美的草原，才能养育肥壮的畜群，使其得以确保生存与发展。草原是适宜牧民生存与发展的最佳场所，如果没有了草原，牧民就无法生存。牧草的优劣和增

减更是直接关系到牧民生活水平的高低、民族发展的兴盛与衰亡。

草原的好与坏,直接决定着牧民的生活状况与生产方式的情况。大面积土地开垦不仅破坏了草原生态,也改变了牧业、农业结构,使农牧民的生活水平逐渐下降,出现了贫困化的趋势。兴安盟地区根本不适合大面积播种,开垦所带来自然环境的变化会影响到在该地区活动的社会群体。由于草原生态破坏和人口增加,人们为生存和发展相互间的资源争夺加剧,激化地区间的和农牧业的矛盾,甚至导致社会的不安定。草原生态的恶化迫使很多的农牧民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和发展的基础。

建国初期,兴安盟地区虽然是半农半牧交错带,但大部分地区还是以畜牧业为主、农业和养殖业为辅,除了突泉县以外的其他三个旗:科右前旗、科右中旗、扎赉特旗都是畜牧业为主的地区,其中科右中旗的牧户为最多,蒙古族人口的比例在全盟排第一位。而建国以来的大面积开垦,科右中旗的丰美草原却变成成为内蒙古沙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也成了全国扶持的重点贫困旗县之一。

到了 20 世纪末,“科右前旗南部形成沙带景观;科右中旗中部出现部分裸露沙丘,即将生成沙带;扎赉特旗出现带状分布的沙丘,并有活化的迹象。由于饲草营养和质量下降,草场的载畜能力由 60 年代每 8.9 亩一个羊单位下降到 80 年代每 11.9 亩一个羊单位,目前已经到了 16 亩养一个羊单位。”^[41]不可忽略的是,随着农耕向草地腹地的深入,当地的部分牧民逐渐转化为农牧兼营或纯粹的农业人口,从而使兴安盟的农垦队伍越来越庞大。

2. 农牧区贫困化

到 20 世纪 90 年代,占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人口 43%的兴安盟,全演变成农业区或农牧兼营区。以兴安盟科右中旗为例: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科右中旗的优质草原不断地被开垦,同时由于草原生态的恶化导致生产力降低。“与 20 世纪 50 年代相比,产草量已经下降了 30%—50%,”^[42]大面积土地开垦实际上导致牧民被迫放弃畜牧业,兼营农耕与养牧业的农牧民被迫放弃养牧业,走向农业的单一化道路,这使得生产力萎缩,阻碍了当地的经济的发展。而农业的单一化道路更是让农牧民走上滑坡路,因为这个地区本来的自然环境不利于农耕,再加上草原荒漠化后的负面影响,对农业生产更加不利。

草原退化后,植被蓄水、保水的能力大幅度下降,在干旱的气候条件下失去抗旱能力,使牧草很难返青,出现大片死亡,反而加重旱情。“土地荒漠化的发生和扩展,不论是固定沙丘的活化或耕地的风蚀,都严重引起土壤的粗化和肥力下降,结果大大降低了土地对物质能量的转化效率和产出能力,土地生产能力急剧下降,作物单产长

期处于低产状态。”^[43]大风、干旱等自然灾害更是逐年增加频繁出现，给农牧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1976年5月出现的10~11级的大风沙天气，科右前旗农田受灾面积为35万亩，刮倒房屋2650间，压死牲畜240头（只），刮断电线38公里、电杆1487根，刮断树木5500株。1981年5月9日兴安盟扎赉特旗遭受暴风雪袭击，死亡大小牲畜7314头（只）。

1985年兴安盟遭受严重旱灾，农业减产，农牧民减收，贫困户增加到23000户，人口126000人，占全盟农牧业人口的11%。1988~2005年，全盟春旱发生率为59%，其中1994、1997、1999、2000、2001、2003、2004年8年时间，就科右中旗未能及时播种农田达6.13万公顷，占当年应播种面积的58.66%；由于连年干旱，牧草长势不好，饱青晚期，饲草缺乏严重，牲畜体弱再加上肯草带土导致疾病而大量死亡就1996年春，大小牲畜死亡5000余头（只）。^[44]

据统计局内部资料记载：从21世纪开始全盟的旱情进一步加剧，2004年大部分地区从3月1日至6月16日累计降雨量不足10毫米；截止6月16日，全盟受旱面积达34.1万公顷，有13万公顷农田无法播种，已播出苗作物萎蔫干枯，牧场受灾面积达170多万公顷，其中没返青草场面积有30多万公顷，牲畜采食困难，造成部分牲畜吃柞树叶死亡。

草原退化后，植被高度也跟着下降，抗雪灾的能力减弱。兴安盟冬天非常寒冷，平均温度-15℃，同样的降雪程度，变矮的牧草被雪覆盖后很容易变成雪灾，牧草失去形成保护植被的外壳的能力，牲畜因吃不到草会大量死亡，这样一来，对农牧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1992年6月，兴安盟中北部地区遭受历史罕见的特大冻灾，致使5个旗县市共35个苏木（乡、镇）、国营农牧场的350多万亩农作物遭到冻害侵袭，其中绝产55万多亩。由于开始退化的草场牧草的抗冻能力的下降，牲畜因没有可吃的牧草而大量死亡。然而牲畜的肥壮是牧民生活的保障，是唯一的经济收入来源，牲畜的乳、肉、皮是牧民衣食的物质基础，也是他们的商品。

随着农业人口的增多，土地开垦面积不断加大，农业向畜牧业进攻，而风沙也向农业进攻。为了治理开垦所造成的草原荒漠化，开始出台很多政策与措施。正在实施的草原保护与建设项目中的“退牧还草”工程建设的主要内容有“通过封育围栏、划区轮牧、舍饲圈养等措施保护现有草地，利用生态系统的自修复能力来加快自然植被的恢复。”^[45]现阶段，草原生态的恢复与重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牧民的收入，退耕还林还草的一刀切政策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牧民失去生活来源。这不应该侵害牧民承包

草场的利益,更是不能一边退耕还林还草一边采取各种理由进行大面积土地开垦。对牧民来讲,以前传统的养畜方式是他们以最小的成本收获最大利润的最佳生产方式,“只需加以看管和最简单的照顾,就可以越来越多的繁殖起来,供给非常充裕的乳肉食品,”^[46]自从实施了“舍饲圈羊”等一系列政策以后,便被迫地迎合去适应这个新的模式,其最终受害者还是牧民。

舍饲,指的是全年彻底禁牧,牲畜完全厩舍条件下实行圈养。由于“舍饲圈养”后成本加大,国家每年每人20元的补助不能抵消新增费用,影响牧民收入,有的甚至出现返贫,牧民不得不卖掉牛羊,陷入了困境。一位老牧民说:“圈养前投入与收入的比例相当与1:10,但圈养舍饲后投入与收入的比例变为恰好相反,成了10:1。”

“舍饲圈养”带来了一定的弊端。首先,投入大收获小是其中一个特点。圈养后成本比以前大大提高,牧民要投入一定的物力盖畜房,投入大量的财力买饲料,这些对牧民来说已经是预算之外、计划之外的支出,再加上饲草料来源问题,农牧民受经费、技术、设备等条件限制,不能自给自供饲草料,只能花费更多的钱来买饲料,导致牧民事倍功半,不得不卖掉牲畜缓解压力,最终失去最基本的生产劳动对象和工具,逐渐走向贫困化的道路。其次是乳、肉、皮的质量下降的问题。对牲畜来说,尤其是地方的品种,千百年的放牧规律已形成比较稳定的采食习性,从4月份开始,一有青草味,就不愿吃干草,随之而来的是牲畜疾病增多,膘情下降。牲畜一边踩踏、大小便,一边啃食踩踏后营养质量下降的饲料,再加上饲料品种的单一化,牲畜乳、肉的产量明显下降,从而影响了牧民的生活水平,陷入了“农业吃牧业”、“风沙吃农业”的恶劣循环当中。

草原荒漠化对农业生产也带来了一定的弊端。1988年,兴安盟科右中旗被列为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旗(县)之一。1988~1990年,全旗贫困人口76275人口,农牧民人均年收入不足250元。1991~1993年,全旗贫困人口13.1万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500元。1994~2000年,全旗贫困人口83800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1000元。^[47]同时,要说明的是科尔沁右翼中旗的开垦面积最大、草原荒漠化程度也是最为严重,草原荒漠化面积占该旗总面积的40%。可见,农牧民的生活水平与草原荒漠化是密切相连的,他们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是草地资源。

二、开垦造成的负面效应

1988~2005 年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温饱成果一览表 (单位: 户、人、%)

项目 数量 年份	扶持户	扶持人口	温饱户	温饱人口	温饱率
1988	3300	19780	2976	17840	90
1989	2852	16883	1917	11348	67
1990	7110	41238	6797	39423	96
1991	6810	36774	5870	31670	86
1992	6900	37260	5866	31676	85
1993	8784	47734	4328	24192	49
1994	3000	15900	2929	15523	98
1995	3200	16300	1994	10548	62
1996	2600	13650	2340	12285	90
1997	4500	23400	2300	11960	51
1998	6726	34300	780	3900	12
1999	15063	72300	6680	32000	44
2000	13619	63800	4872	22800	36
2001	17926	82960	4710	19800	26
2002	19398	85170	8552	35087	44
2003	11924	50083	5355	22500	45
2004	9323	40015	5003	21472	54
2005	12906	51025	3978	15500	31
累计	155941	748572	77247	379524	50

注:1988-1990 年,农区人均纯收入超过 200 元、牧区人均纯收入超过 300 元为解决温饱;1991-1996 年,人均纯收入农区超过 500 元、牧区超过 800 元为解决温饱;1997-2005 年,不分农区、牧区人均纯收入超过 625 元为解决温饱。

资料来源:科尔沁右翼中旗志 兴安盟统计年鉴

笔者在牧户居住的一个嘎查进行了问卷调查。从调查 26 户牧民的纯收入来看,收入差距比较大。其中有 20 户的总收入是小于总支出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处于负债经营状况中,这些牧民的家庭长为债务所累,这使他们的精神状态受到影响,对前途失去信心,劳动积极性得不到提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兴安盟地区虽有一定的发展,这些年的总财政收入一直不容乐观。在全区 12 个盟市中,属于后几位,2007 年、2008 年均属倒数第一。从总体实力上讲,兴安盟还是属于贫困落后地区,农村牧区困难户多、负债经营的债务户多,发展生产周转资金困难。

2002 年的一次调查显示,兴安盟共有 80 多万人口的口粮不足。

兴安盟地区的变化即开垦所带来的草原的荒漠化、沙尘暴的肆虐、干旱天气的频繁出现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牧区生活的更加艰难性。草原是牧区蒙古民族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草原的破坏、生态环境的恶化将严重影响到农牧区的生活水平,甚至影响到生产方式的变更。

兴安盟地区的贫困很大程度上是草原的贫困、是生态的贫困。而草原生态的贫困是由人们不合理的活动造成的,是主观能动性违背客观规律的结果。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非常关键。

（三）开垦与游牧、畜牧业衰退

开垦所带来的草原荒漠化不仅直接威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会威胁草原文化的生存与发展、破坏人与草原的和谐。草原是草原文化存在和发展的载体。由于开垦所带来的草原面积缩小、生态恶化,草原文化将失去存在的载体。没有了畜牧业,游牧文化的底蕴,草原文化也就不复存在。草原文化基于传统的游牧文化和现在的畜牧业文化。

兴安盟成为游牧与农耕两个民族相互扩张的地区,已有漫长的历史。期间,“凡游牧民族统治的时期,大片草原保持了水草丰美、蓝天绿地的景象,局部地区出现的生态恶化也受到了遏制。游牧民族之所以能够维护自然生态的完好状态,不仅是由于他们以畜牧业为主的产业选择,也得意于他们的游牧文化。”^[48]而与此相反“凡农耕民族主宰草原的历史时段都曾导致草原退化、生态受损。”^[49]“我国的环境恶化是伴随着农耕文化向游牧文化区推进开始的。”^[50]它的表现形式为在草原牧业地区不断地、大量地草原开垦。开垦不但剥夺牧民赖以生存的空间,也逐渐断送了他们的经济收入的来源。

随着开垦规模的不断扩大,植被遭到严重破坏,蒙古高原也由原来的游牧区走向农业区,畜牧业逐渐衰退。这种趋势、走向是否正确、是否合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

我们需要审视、需要进行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比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理环境，经济基础，人口结构和历史演变的特殊性，会形成不同的文化氛围。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今天的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体系。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互补互利，冲撞并融合，在对立统一中发展、传承过来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兴安盟已经由原来的传统游牧逐渐变成了定居式的畜牧业，有些地方变成了半农半牧区，但无论是传统游牧还是定居后的畜牧业，在广义上，他们所传承的文化结构是相同的，对草原生态一直起着积极的保护作用，而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为他们的生活水平提供了物质保障，他们得以繁衍生息。下面以蒙古族和汉族为例，进行“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比较。

1. 两种文化来自不同特性的地理环境

“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这两个不同的共同体，是来自于截然相反的自然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环境决定着特定的文化系统，同时也造就了不同的民族性格。蒙古高原地处干旱的自然环境，地下土层广泛分布了疏松沙层，加上气候干燥，雨量奇缺，气候温差大，寒冷天气较多，所以这个地方只能适合长耐寒耐旱的草木植物。千百年来，居住于这一地域的人们祖祖辈辈都深知这里的自然环境与气候变化，不宜从事农耕，按着顺应自然的规律适应环境并选择了相对应的产业——游牧。在这样的共同生产方式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共同的文化特点，而这种共同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素质融合成为人们共同体——游牧民族。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气候变化培养了他们与自然搏斗的不折不挠的精神。著名诗人巴·布林贝赫写道：“来自大自然的民族是纯朴的、粗犷的。清新的空气，明丽的阳光，晶莹的露水，给了他们单纯的心灵；苍茫的原野，狂暴的风雪、严峻的天空给了他们粗犷的性格”^[51]

正象农民依赖土地一样，牧民离不开草原和家畜。“辽阔的草原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养育过匈奴、乌桓、鲜卑、突厥诸族，同样，他为蒙古族这个马背上的民族提供了一个独特的、隔绝的历史地理环境，在传承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系统的基础上，经过本民族长期的开拓和实践，创造出灿烂的富有草原色彩的语言词汇、饮食、服饰、建筑、礼仪、祭祀、宗教等等游牧文明。”^[52]

而与之恰恰相反，中原地区却自然环境良好，气候湿润，地势较平坦，水力资源丰富，尤其是有雨量充沛的黄河流域，所以很适宜农作物的大面积种植。千百年来，这里生息着以农耕为生的农耕民族，在固定的土地上辛勤劳作，培养和积累了大量宜于种植的农作物，同时也发展了手工业、养殖业等。而农业生产对自然环境和气候的

依赖性较强,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与产业选择即培养了安分、守一、精耕细作、吃苦耐劳的民族性情。这些特点,导致了传统农耕文化的稳固性和排他性。正因为如此,时至今日,占主导地位的农耕文化对游牧文化始终持着一种“否定、排斥”的态度。而大自然赐予游牧民族草原般的胸怀,尝尽生活的艰辛、环境的艰辛,又从中不断地找到乐趣,所以“愿意接受新经验和新感受,能够很容易地吸纳别人的长处和优点,使自己永远处于开放的心理状态。”^[53]对外来文化,不仅不排斥,且很容易吸收异族他乡的文化、文明,与自身的传统游牧文化融为一体,形成了游牧文化的融入性、开放性的特点。

2. 两种文化的经济基础和生态价值观不同

农耕经济成为中原地区社会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有着漫长的历史,对农耕生活的依赖和思乡是中国文学的无尽主题。历代统治者大都提倡“耕战”,将“重农固本”为治国、巩固、兴邦之道。作为农耕传统文化重要内容的“天人和谐”思想也是与农耕生产及其自然环境联系在一起的。在农耕经济系统中农民在“人—耕地—天”这种循环当中生活着。耕地是他们必不可少的最直接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种植物的生长及丰收离不开老天的“恩赐”,可以说,农耕经济的“天人和谐”是被动的和谐,或者表现为被动的“听天由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同一块土地上辛勤耕耘,遵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原理,或者表现为主动的积极进取,在土地上勤劳耕耘,为了从土地获得更高的利益而不断地积累农耕技术知识。他们有集中定居的特征,集中定居的生活特点很容易导致人口的快速增加。自古以来,正因为这个特点农耕民族的人口一直保持着上升趋势。

在游牧经济中,“人—畜—草”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必不可少的几个要素。牧民作为“人—畜—草”食物链中的最高层,往往都是主动地、竭尽全力、有意识地为这一系统的正常运行而劳作,充满了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智慧。“如果说牲畜不仅把乳品而且还把肉类也交给了牧民,那么,牧民也至少替他们的牲畜找到了生活资料。无论哪一方面如果没有对方的帮助都无法较大量地在草原上生存。”^[54]在这个环节中哪一个都不能缺少。游牧民族经过长年的积累与总结,对于放牧草地的利用和保护有着一套合理的方式,他们随季节而移动,逐水草而放牧。牧场一般围绕沿河流湖泊一带,而且遵循每一块牧场承载的牲畜载畜量来严格的限定放牧。在历代的现实当中,这种经济方式与草原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和生态平衡从未被打破,即使有很多自然灾害发生,整个生态系统自身也能很快恢复过来。因为牧民随着草原优劣随时进行调整,假如草场不够用或草原有被破坏的迹象,就会及时迁移,给草场足

够恢复的时间。这样一来，游牧经济以自身的规律生存发展的同时与草原生态系统以一种正常的状态维持着草畜平衡。

游牧文化的经济特征不仅体现在游牧生产运转之中，也体现于游牧生活的具体实践当中：草原是牧民赖以生存的第一物质条件，他们深知草原资源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关注的不是自己劳动的周而复始与眼前的利益，而是草原的周而复始和物质的循环利用。在这个能量传递过程中，牧民保证了食物链中能量传递的正常进行，保证了整个生态系统能量循环的正常进行。这种合理的物质文化创造，为游牧民族奠定了生存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同时也有效地保持了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游牧经济最大生态特点是以草原资源消耗最少为标准，保证草原生态的持久平衡；牧民对所生活中的草地的特征、性质、草的长势、水利等等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观察力，逐水草迁徙是与自然的变化规律紧密挂钩的。通过畜牧活动，保护和改善了草原生态系统中能量循环、草质循环，以最少的资源消耗达到高度效应、达到和谐发展的状态，这是人类文化对自然环境的单纯性适应。“人一畜一草”的运动系统中，草原和家畜的生产力是牧民物质生活的来源与保障。农耕经济则以土地最大产出为标准，保证土地资源的精巧利用。农耕经济以耕地的持久与生产力的稳定产出为其主要动力，这是人类文化对自然环境的一种适度的适应。因此，农耕民族在适应自然时，表现为被动的“听天由命”，按着这个自然规律主动、积极进取，在土地上精雕细刻，积累许多农耕技术知识，以便从土地中获得更高的收益而打基础。

3. 两种文化对“草原和家畜的理解”完全不同

农耕文化的价值观没有“草地”的概念。因为野草对农作物的生长具有破坏和阻止的作用，农耕民族为了确保农作物的有效增长，提高效益，想方设法把野草除掉。这样一来，长期的实践生产活动当中，在人们头脑中逐渐形成了对“草”排除、厌恶、贬低、鄙视的意识和情感。这种情感和意识自然表现在他们的语言文字上，比如以汉字汉语为例有：草窝、草包、草稿、草芥、草率、草寇、草稿纸、草民、草菅人命、斩草除根、草薶禽猕、草草了事等。对“草”的这种厌恶感甚至延续到了以草木为食物的牲畜身上。比如汉语上讲的：羊肠鸟道、羊质虎皮、牛头蛇尾、吹牛、拍马屁、马马虎虎、对牛弹琴、牛头马视等。可以看出，农耕文化中带有排斥、蔑视畜牧业的价值观念，是导致今天的“农进牧退”的精神来源。

而对以经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来讲，草原和牲畜是他们最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源，对草原和牲畜的依赖和重视甚至敬畏是农耕民族远非能够理解的。这种特殊地位反映、融入在他们的文化与艺术里，从大量民歌、赞语和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中都

能体会得到。他们甚至把物质世界的本原试从草原探索,民歌里唱道:“我从草原来”、“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我和草原有个约定”。把顶天立地的男儿形容为“草原上雄鹰”,把豁达的性格形容为“草原般的胸怀”。蒙语里“草”叫做“额卜饲”,而它的词根“额”是蒙语当中与“母亲”的词根相同的,可见,对“草”的敬畏和重视程度。千百年来,游牧民族祖祖辈辈珍惜草原上的一草一木,以认真、敬畏的态度对待草场和牲畜,长在马背上的民族蒙古族,对马有着特殊的感情,在蒙古社会,要是有人打马的头部是犯法的,不爱护草场,要有故意破坏草场者会受到惩罚,甚至会杀头。《黑鞑事略》中就记载道:“草生所属地者,遗火而熟草者,诛其家。”^[55]在这样的文化情感上建立的价值观对草原生态一直起着积极的保护作用。

三、消除负面效应的具体措施

原因和结果辩证关系的原理对于指导人们认识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准确地把握因果联系,能增强实践活动中的预见性,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排除不利后果和严重后果产生的原因。

以上分析表明,兴安盟大面积土地开垦和草原生态破坏、气候变化与农牧区贫困化有着因果联系。要想消除诸多不良影响,首先就要转变“农耕文明、游牧落后”、“农业先进、牧业落后”的价值观念,确立生态价值观。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因地制宜的方法解决问题。兴安盟的特殊自然条件不利于大面积的耕种。要想可持续发展、提高农牧民收入,畜牧业应走向工业化的道路,向现代化过渡。另外,合理利用水资源,调整产业结构,控制人口膨胀,减轻农牧区人口压力,从而转移大量人口,政府部门采取措施,提高农牧区人员素质,脱离贫困奔小康。

“真理”是对同一对象、同样条件下是一元的、绝对的,有其适用的条件和范围,如果超出这个条件和范围,真理就会变成谬误。在阳光雨水条件充足,自然环境温和的中原地区发展农业生产,可以说是“真理”,但是在多风干旱自然环境恶劣的蒙古高原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这个“真理”就会超出其适用的条件和范围而变成“谬误”。

(一) 转变价值观念、确立生态价值观

辩证法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人类思想活动、主观意识、价值观念等主观思想会影响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要想改变兴安盟地区不良面貌,首先要从思想上捐弃“农耕文明、养牧落后”的传统观念。不改变价值观念,不从实际出发,一切政策建议都显得无能为力。“文明与落后并不完全以某一种生产方式和经济形式来决定的。只要是顺应自然规律,符合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水平,保持人与自然协调平衡发展,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和经济形式都是先进的。”^[56]

俗话说的好，民以食为天。这里所指的“食”不单单是狭义上的五谷杂粮的粮食，而应该理解为老百姓的最基本物质基础“食物”。对农耕民族人民来说粮食是他们的主要食物，而对游牧民族来讲家畜的“肉、乳”是他们的主要食物。然而更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无论是五谷杂粮还是牲畜的肉、乳对人类的生存及发展都是不可缺少的必要物质，无论是游牧民族还是农耕民族都会有所需要。那么，当年提出的“牧民不吃亏心粮”的时候也应该设计到“农民不吃亏心肉”等一系列问题。正是在“农耕文明，养牧落后”这种农业思维的主导作用下，建国以来开垦了大面积草原。

牧业、农业、工业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关系，而不是互相吃掉、并吞的问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离开工、农业及牧业的发展，其中任何一种生产方式的落后与消亡，都会影响甚至会危机到它的生存与发展。种植业和畜牧业本身并没有哪一个是先进与落后的问题。只是在不同地区、不同自然环境、不同历史社会条件下所发挥的作用不同而已。依赖当地自然地理条件的规律来决定哪一个会更适合人类生存发展。但是由于“农耕”先进，“养牧”落后这种片面的传统思想一直以来影响着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方式及产业选择，阻碍了当地的更好、更快发展，在兴安盟地区表现尤为明显。根本点在以执政党的“农业”思维去分析、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无论是“农业”思维还是“牧业”思维，其出发点都是善意的、都以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国民经济为目的，但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论事、要因地制宜地方法解决问题，而不能以一刀切的方法一概而论。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理论精髓。兴安盟地区近 60 年的实际情况，不得不说明了一个问题。束缚牧业经济，大力开发农业经济、尤其大面积的开垦，造成了当地老百姓饱受沧桑，一方面受着大自然的报复，另一方面牧民面临着失去经济来源的源泉，使牧区逐渐地贫困化。认识来自于实践，兴安盟农牧民的生活环境及现状足已说明了这一切。正因为以这种“农业”思维的价值取向来衡量、标准“牧业”思维，导致了今天的兴安盟地区草原生态破坏和贫困落后的局面。自古以来，兴安盟境内为游牧民族繁衍生息的摇篮。春秋时期，境内为东胡游牧地。汉、晋时期，境内为鲜卑属地。南北朝时期，为室韦属地。到了唐朝、辽代、金代，也保持着当地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与美好家园。到了元代，蒙古民族驰骋于草原，到目前为止，以蒙古民族为首的北方游牧民族繁衍生息于兴安盟地区。草原是游牧民族子子孙孙起源、生存、发展的摇篮，更是游牧文化发芽、生长、走向繁荣的摇篮。

正如俄罗斯著名学者古米列夫评价到“游牧民族在他们自身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创

造了独具特色的社会文化类型。对此,人们不应认为是粗俗、落后和停滞不前的。”^[57]“而农耕民族对此却视而不见,没有根本的认识,“逐水草而居”成了他们描述游牧文化落后的代用词。把北方民族视为落后民族,甚至把林海茫茫中以林副业为生的居民视为野人,是中原汉族根深蒂固的观念。”^[58]由于“农耕发达、牧业落后”的农业思维的根深蒂固,使得草原日以哭泣,使草原牧民失去生活场所,断送经济收入来源,出现了得不偿失的现象,导致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失衡。在高度强调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深刻反省,是否真正做到了资源的长期利用,是否真正为民族地区的老百姓着想,保护了农牧民的切身利益。

“我国发生的草原荒漠化主要属于垦殖型荒漠化,导致垦殖型荒漠化的直接原因是草原经济沿袭了“重农轻牧”的产业选择。”^[59]回顾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生态演进过程,我们看到,从先秦的“帝亲耕,后亲蚕”到后来的“主谷制”、“屯田制”,再到现代的“以粮为纲”和生产建设兵团,无论中间经过了哪些历史阶段,有过怎样的统治政权,一个不争的事实却都是把草原生态系统“定格”在农耕产业模式上。甚至时至今日,面对日益恶化的草原生态环境,我们依然按照农业“包产到户”的思维方式“平分牲畜到户”,把草原分割得支离破碎后由牧民分户“承包经营”。究其根源,是因为农耕文化在草原地区成为了主流文化和主导地位,造成了游牧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大部分草原地区的断裂或消失,致使最适应草原生态系统的游牧经济发展停滞并逐渐衰落。这种由于文化断裂导致的产业选择错误,是草原荒漠化的重要原因。要想可持续发展,立足点必须是在保护的前提下,科学地、合理地利用草原,确立生态价值观。

（二）畜牧业必须向现代化过渡

“蒙古高原的气候是很不稳定的,其总特点是气温低、冬季长、无霜期短、气温年较差、日较差均大……土地生产力低而不稳……人们只能遵循生态规律……不能过多开垦,不能走发展农业的道路。”^[60]

新中国成立以来,内地汉族移民大量涌入草原地区,随着新垦农田的迅速扩大,草原生态极具恶化,广大农牧民面临严峻的挑战。随之而来的是把畜牧业逐渐逼向农业化的道路,农业化的路子只能让更多的农牧民更加贫困化。气候条件的不稳定、自然环境的恶劣再加上农业成本的提高,农牧民深受其生态环境的折磨与报复,逐渐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消极并走向贫困。

为了改变农牧区贫困化现状,使牧区走向工业化道路是应选择的出路,走向工业化既能保护畜牧业又能发展畜牧业。而走向农业化,出路反而更加狭窄,畜牧业不但

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还会面临消亡，农业发展也受影响。农业、畜牧业、工业的并存及相互扶持的作用会让民族地区的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笔者认为牧区工业化，建工厂，开矿山，虽然很可能会面临环境破坏，但比农业化的结果要好的多。传统的草原畜牧业经济是自给自供的产业模式，由于长时间处在边缘地带，国家、自治区、政府的投入甚少，一直无法和国家经济结构接轨，脱离了市场经济，严重制约畜牧业的发展。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草原资源走向工业化的道路，来刺激牧区经济、快速发展牧区经济、改变牧区面貌、解决面临的困境。

首先，要发挥畜牧经济的优势。现在人们都追求所谓的无污染，又不破坏生态环境的“绿色产品”，兴安盟就完全有打造“绿色产品”的可能和条件。奶牛的食物系统是一个生产的过程，其本身就是一个工厂。吃的是草，通过加工生产出的是肉、奶。羊也如此，还有牛羊肉更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营养品。据专家研究认可，羊肉在所有肉类里营养价值最高。兴安盟的乳、肉、绒、皮、马铃薯等产业应成为全盟产业化经营主导产业，成为“伊利”、“蒙牛”“草原兴发”等全国驰名商标的重要资源来源之一。

要建立“绿色畜产品”，国家政府应采取保护价格收购制度来保障牧区经济发展。目前，农民的粮食有保护价收购制度，但牧民的畜产品就没有这样的待遇，还会出现畜产品的价格普遍降低的现象。例如：1998-2000年，在兴安盟科右前旗，当时牛奶价格1公斤还不到3角。粮食是农民的经济来源及主要食物，对牧民来说，畜产品肉、奶等也是他们的主要食物及经济来源。无论是粮食还是畜产品都是国家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那么也应当对农牧地区的畜产品采取一定的价格保护措施，这样既会保护广大农牧民的生活利益，也会促进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要开矿山，要开发地下资源。兴安盟位于大兴安岭多金属成矿带中南段，位于国家16个重点金属成矿区带的第5个成矿带—大兴安岭多金属成矿带上。例如：科右中旗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已探明的矿产有金、银、铜、铁、铅、锌、石灰石、大理石、蛇纹岩、珍珠岩……等。^[61]

但这些矿产资源开采比较晚，由于经济基础较差、技术力量薄弱，发展一直缓慢。兴安盟非金属矿资源也很丰富，但开采利用的品种却很少，到目前为止只开采了粘土、建筑砂石、石灰石、珍珠岩、花岗岩等几个品种。国家、自治区、当地政府应鼓励并投入一定的人、财、物力，大力开发矿产资源，并吸纳当地农牧区多余的劳动力。这样一来，一方面也可以缓解农牧区人口压力，减轻草原人口承载力。另一方面，增加当地的财政收入，反过来，地方财政可再投入到畜牧业，这样就有了双赢的效果。例

如：开发煤电项目不仅提供多个就业岗位，而且会有利于草原的建设与保护。

（三）退耕还草、合理利用水资源、调整产业结构

草原牧区和农牧交错区的耕地全部是由开垦草原演变而来。目前，兴安盟科右中旗是土地沙化的重灾区，也是生态治理的重点区域，应逐步退耕还草。只有这样才能还草原以本来面貌，符合自然规律和生态规律。

“2000年1月29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25度以上的坡地应当用于植树、种草……逐步退耕……种草。”^[62]科右中旗2006—2010年的治理“三化”草原五年规划里也已经提到了落实人均8亩地的标准，坚决清理肆意扩大的耕地，实施退耕还草的建议。

但退耕还草涉及到政策问题 and 经济利益问题，而政策问题应从实际出发加以完善。“如：农村（生态恶化地方）退耕还林还草，有补贴政策；牧区禁牧休牧也应有相应补贴，特别是目前牧区草原开垦的退耕还林还草上落实补贴比较难，原因是牧区草原开垦并未曾列入国家垦殖计划来实施的，因此，草原上开垦的耕地在国家机关有关部门那里得不到确认，无法得到补贴。这种政策不加以修改和完善，耕无法退，林草也更无法还。”^[63]草原开垦者为获得利润开垦时投入了一笔资金，尚没有取得回报时想让他“退、还”是很难做到的。就算可以，有的也是明退暗种。所以，进一步完善政策制度，确保“退耕还草”。

另外，从耕地面积和从事农业人口的数字可以断定，在兴安盟地区实施完全退耕是不可能的。那么，什么样的耕地可以退，什么样的耕地可以继续耕种，这是需要说明的事情。据了解，兴安盟地区的农田几乎都是旱田。在东部区，国家已经投入一定的资金在田边挖了机井，但是还有大量农田，如丘陵地带的农田由于凹凸不平不具备灌溉条件，遇到大旱年，这些农田歉收甚至绝收。笔者认为，这种旱田要大量退耕，退耕后浅层松土，施农村牧区容易得到的牛羊猪粪等肥料，并播种适合当地的植被，到秋天植被种子完全成熟落地才收割植被。这样既可以保护自然环境，农牧民也能收到一定程度的饲草料，以节省购置饲草料的资金。已经完全成熟并落地的种子第二年能够自动长出同样植被，这时给其施适当肥料就能达到既保护自然环境，又能收到一定的饲草料，以节省购置饲草料的资金的双赢目的。剩余土地，尤其能够灌溉的土地要走生态农业的道路。

政府应加大投资建立大中型水库，合理利用水资源。兴安盟地区雨水少，干旱天气多，导致庄稼受旱灾。旱灾并不是人力不可抗拒的，不是没有抗旱能力，只是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原地踏步。“兴安盟地区坐水点种抗旱技术至今已有37年，仍无新

改进。甘肃、宁夏的旱情比兴安盟严重得多，他们采用建水窖的办法，解决了群众生活和生产用水。”^[64]

在内蒙古西部区，全区黄河流域的河套地区农业，每年有几次大型的灌溉，水源主要靠黄河水，其灌溉纯粹是粗放型的表面灌溉，这种灌溉必然导致水资源的大量浪费，也做不到均匀灌溉，凹陷的洼地水源大量集结，稍微隆起的地方就会灌溉不到，尤其是春苗出生时期，放水的局部地带的嫩苗由于水的冲力大量死亡。东部区的机井灌溉情况也与西部区雷同。但是把这种表面灌溉技术转化为滴灌技术最起码需要两个条件：首先需要足够设备；其次需要大量技术人员。而具备这两个条件就会需要购置设备的大量资金和人员培训的大量资金。在兴安盟，恢复和重建草原生态，改变农牧区贫困化现状，资金是个最大的问题。从生态环境建设的公益性角度来说，草原生态恢复、重建的资金应该由国家、地方政府，包括收益的相关省市地方政府大量拨款和当地农民适当投入的形式相结合。

兴安盟可借鉴学他人的抗旱方法，提高农业生产。兴安盟水资源与自治区 12 个盟市相比是比较丰富的，水量仅次于呼伦贝尔市。全盟有大小河流 200 余条，较大的有洮儿河、归流河、霍林河、哈拉哈河、阿荣套河，大小湖泊 70 多个。盟境内河流有四个水系，盟内流域总面积 5.5071 万平方公里。充分利用地表水，合理开发地下水是提高农业生产的必要保障。应加强以水利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通过全部打深水井、上输变电路，采用固定、半固定式管灌和喷灌相结合的节水灌溉模式，彻底解决农业“受制于水”的根本问题。

在有了水利条件的基础上要优化种植业，其中应该优化种植结构和品种结构。全盟各级党委、政府面对农产品市场形式，应以种植业结构调整为突破口，帮助农牧民找信息、拉订单，进行有针对性的技术培训和示范推广，引导农牧民改变传统的耕作方式和观念，让农牧民在亲自实践和直接受益中自觉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新思路。本着“发展特色种植、开发绿色产品、推进产业化经营”的思路，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种植业。例如重点抓好优质大豆、托毒马铃薯，优质水稻、俄体粉条、专用玉米、专用小麦等。

（四）减轻人口压力、提高人员素质

在内蒙古自治区实施“农牧业产业化和城镇化”战略方针的大好形式下，减少农牧区人口，降低草原人口压力也是一种恢复草原生态和脱贫致富的一个出路。解决农牧地区人口问题就得大量转移人口，转移到第二和第三产业中，这也需要政策的力量和经济手段的结合。目前，兴安盟农牧区的人口转移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人口的自

然转移，主要是农牧区多余劳动力或因多年歉收被迫进城打工人员，这部分主要以年轻人为主。二是政策性转移，主要是生态移民。这两部分人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草原的人口压力和承载压力，也推进了兴安盟地区城镇化的进程，但是也出现了诸多问题。

例如：人员素质跟不上，达不到强民致富的目的。以上谈到的第一种类型的人员，即进城务工人员大部分都是小学、初中毕业生，最高文化学历者也就是高中毕业生。他们没有很好的文化素养，也不具备一技之长。所以进城后大部分人很难找到工作，即使找到工作，也是作强度大的重体力活，如工地搬运、捡垃圾、建筑垒墙、扫大街等。第二种类型人员大部分是牧民，他们世代以牧为生，这些人脱离了牧业生产领域，就不知道从事何业，这样一来他们的处境比第一种类型的人员更加艰辛，择业出路更为狭窄。笔者在调查中得知，国家给政策性生态移民很多补贴，拿到补贴的一小部分农牧民也在做一些小本生意，如开饭馆、学生小吃店、小旅店、摆早夜摊等，但由于之前从来没有从事过这类职业，所以经济效益不很乐观。大部分人拿到补贴后没能用到刀刃上，过了两三年时间补贴的钱也就坐吃山空了。

针对这种情况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在临近农村牧区的城镇，要大力承办职业技术教育，把扶贫款、移民补贴直接投入到对他们的教育、培训上去，而且要落实到位，这才是一个长久之计。就兴安盟地区来说，目前主要缺乏农牧业技术人员、兽医人员、传统工艺人员等，所以培训也应该围绕这些领域展开。在教育、培训的措施、途径方面，只要扶贫款、移民补贴款项能够满足培训人员吃住学习费用，当地政府给一定的择业政策优惠，受培训人员还是大有人在的。同时在临近农村牧区的城镇承办这种培训，也可以节省大量路费，家庭住址近的学员也可以做到走读。

其次，要发挥具有一定手艺人的一技之长，这样既可以使他们有业可做，也可以提高其经济收入。笔者调查了解到，兴安盟农村牧区有大量的掌握特定手工艺的人员，民族传统手工艺方面的人才更多一些，但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等条件限制，这些人还不能发挥他们所特有的长处。在这方面，当地政府或有实力的企事业单位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通过当地政府或企事业单位把这些人组织起来，给他们提供产品销路，鼓励他们招收学员，以便使这种传统工艺得到传承，使更多的人获谋生技能，找到更多生活的出路。

注 释

- [1]刘严随 陈百明.中国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地理利用[J].覆被变化研究 2002. 2 p324-341
- [2]包赛音.中国少数民族和谐思想研究[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 1 p57
- [3]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编.2007 内蒙古统计年鉴. p640-650
- [4][8][11][13][37][44]兴安盟志[M]上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 5 p3 p3 p219 p222 p155 p53
- [5][6][9][10][24]兴安盟志(1996~2005 年)[M].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7. 7 p109~165 p188 p191 p317 p317
- [7][27][32][43]蒋德明 刘志民等.科尔沁沙地荒漠化过程与生态恢复过程[M].2003 p41 p53 p43 p41
- [12]马福祥.蒙藏状况[M].1931 年蒙藏委员会排印本. p13.转载乌日陶克套胡.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变迁[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9 p198
- [14][15][21][56]云和义.清代以来内蒙古大量开垦土地的主要原因[J].内蒙古农业科技.1999. 12 p10 p10 p9 p8
- [16]内蒙古日报 1999 年 2 月 3 日
- [17][58]恩和.草原荒漠化的历史反思:发展的文化维度[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 3 p2 p7
- [18][蒙古]托摩尔扎布等.蒙古的游牧人[M].西里尔文.乌兰巴托 1999. p14
- [19]色音.蒙古游牧社会的变迁[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6 p51-52
- [20]色音.蒙古游牧社会的变迁[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转载云和义.清代以来内蒙古大量开垦土地的主要原因[J]内蒙古农业科技.1992. 12 p10
- [22][33][35][36][48][49][63][中国]额尔敦布和 恩和 [日本]双喜.内蒙古草原荒漠化问题及其防治对策研究[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 12 p13 p12 p165 p316 p106 p106 p160
- [23]王铎.当代内蒙古简史[M].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 5 p134-135
- [25]包和平 陈伯霞.草原畜牧业生态系统及其内在矛盾的哲学刍议[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7. 5 p20
- [2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人民出版社.1955 p145
- [28][30]苏和 刘桂香 何涛等.草原开垦及其危害[J].中国草地.2005. 11 p62 p62
- [29]敖仁其.草原产权制度变迁与创新[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 7 p118
- [31][41]兴安盟土地管理局内部资料
- [34]旁万才 董玉秋 高莲花.兴安盟沙尘暴天气的气候学特征分析[J].内蒙古气象.2002 p22
- [38]钱俊生 余谋吕.生态哲学[M].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 p11
- [39]郝时远.21 世纪民族问题的基本走向.载《国外社会科学》2001 第 1 期.葛根高娃 乌云巴图.蒙古民族的生态文化[M].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 11 p13
- [40]包玉山.内蒙古草原畜牧业的历史与未来[M].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3 p16
- [42]科右中旗“三化”草原五年规划 2006-2010
- [45]宋洪远.中国草原改良与牧区发展问题研究报告[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7 p77
- [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M].人民出版社.1972 p240、49
- [47][61]科尔沁右翼中旗志[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p424 p4
- [50][59]胡箴.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生态文明之比较[J].理论导刊.2005. 11 p77 p77
- [51]巴·布林贝赫诗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p85
- [52]欧军.草原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比较[J].文科教学.1994. 1 p95

- [53] 李尔只斤·吉尔格勒. 游牧文明史论[M].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2. 3 p121
- [54] [英] 汤因比著. 曹未风等译. 历史研究[M] 上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p216
- [55] [宋] 徐霆. 黑鞑事略. p6 转载 欧军. 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之比较[J]. 文科教学. 1994. 1 p97
- [57] [蒙古] 托摩尔扎布等. 蒙古的游牧人[M]. 西里西尔文 乌兰巴托. 1999 转载 恩和. 草原荒漠化的历史反思: 发展的文化维度[J]. 内蒙古大学学报. 2003. 3 p7
- [60] 乌峰. 蒙古族生态观的哲学分析[D].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p26
- [62] 中国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生态补偿: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5 p130
- [64] 赵悦秋. 对兴安盟脱贫致富的反思[J].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2002 p19

参考文献

著作类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卷 [M]. 人民出版社. 1995
- [2]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M]. 人民出版社. 1984. 10
- [3] 马克思恩格斯论环境[M].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3
- [4] 额尔登泰 乌云达赉. 蒙古秘史 [M].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0
- [5] 亦邻真. 蒙古秘史[M].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87
- [6] 乌兰夫革命史料编研室. 乌兰夫论牧区工作 [M].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0. 10
- [7] 郭书田. 中国草地生态研究[M].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89
- [8] 高吉喜. 可持续发展理论探索——生态承载力理论、方法与应用[M].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0
- [9] 内蒙古草地资源编委会编辑. 内蒙古草地资源 [M].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0
- [10] 郝维民. 内蒙古自治区史[M].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1
- [11] 邢旗 刘东升. 内蒙古天然草地上生物量动态研究[M].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1993
- [12] 刘宗超. 生态文明观与中国可持续发展走向[M].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 [13] 色音. 蒙古游牧社会的变迁[M].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9
- [14] 王铎. 当代内蒙古简史[M].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8
- [15] 孟驰北. 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上下册) [M]. 国际文化出版社. 1999
- [16] 阿岩. 蒙古族经济发展史[M]. 远方出版社. 1999
- [17] 崔瑞堂 马大正等. 内蒙古历史与文化[M].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0. 9
- [18] 杨舜才. 环境与发展[M]. 远方出版社. 2000
- [19] 钱俊生 余谋昌. 生态哲学[M]. 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4. 7
- [20] 学尔只斤·吉尔格勒. 游牧文明史论[M].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2
- [21] 包玉山. 内蒙古草原畜牧业的历史与未来[M].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3
- [22] 蒋德明等 刘志民等. 科尔沁沙地荒漠化过程与生态恢复[M].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3
- [23] 闫天灵. 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M]. 民族出版社. 2004. 12
- [24] 葛根高娃 乌云巴图. 蒙古民族的生态文化[M].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4. 11
- [25] 王明玖等. 退耕还草科学与技术[M].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4
- [26] 敖仁其. 制度变迁与游牧文明[M].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4. 12
- [27] 新吉乐图. 生态移民[M].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5
- [28] 乌日陶克套胡. 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变迁[M].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 9
- [29] 马林. 民族地区的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M]. 民族出版社出版. 2006
- [30] 刘钟龄 额尔敦布和. 游牧文明与生态文明[M].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1
- [31] 姜凤歧 曹成有 曾德慧. 科尔沁沙地生态系统退化与恢复[M].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2
- [32] 宋洪远. 中国草原改良与牧区发展问题研究报告[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 7
- [33] 施文正. 中国草原执法概论[M]. 人民出版社. 2007. 5
- [34] 包赛音. 中国少数民族和谐思想研究[M].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8. 1
- [35] 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编. 中国草原执法概论[M]. 人民出版社. 2007. 5
- [36] 中国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生态补偿: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5
- [37] 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编. 2007 内蒙古统计年鉴

- [38]兴安盟统计局编. 2006 兴安盟统计年鉴
- [39]兴安盟志[M]上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7. 5
- [40]兴安盟志(1996~2005 年)[M].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7. 7
- [41]科尔沁右翼中旗志[M].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42]巴·布林贝赫诗选[M].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译文、外文类

- [1][蒙古]博·苏米亚. 蒙古族游牧文化: 继续生存还是行将消亡?(西里尔文)[M]. 乌兰巴托. 1998
- [2][蒙古]托摩尔扎布等. 蒙古的游牧人(西里尔文)[M]. 乌兰巴托. 1999
- [3][波斯]拉施特. 余大钧译. 史集(共三卷, 四册)[M]. 商务印书馆. 1986
- [4][美]唐纳德·沃斯特. 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M]. 商务印书馆. 1999
- [5][美]霍尔姆斯·罗斯顿. 环境伦理学[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 [6][英]大卫·皮尔斯. 绿色经济的蓝图[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 [7][英]汤因比著 曹未风等译. 历史研究[M]上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 [8][法]雷纳·格鲁塞. 龚铎译. 翁独健校订. 蒙古帝国史 [M]. 商务印书馆. 1989
- [9][日]后藤十三雄著. 玛·巴特尔 王银莲译. 《蒙古的游牧社会》[M].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0. 10
- [10][中国]额尔敦布和 恩和. [日本] 双喜. 内蒙古草原荒漠化问题及其防治对策研究[M].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2
- [11]扎格尔. 蒙古游牧文化溯源(蒙古文版)[M].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1
- [12]Van Auken. Shrub invasions of north American Semiard Grassland.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2000
- [13]Warren, Y. C. Sud and B. Rozaov. The future of deserts. Journal of Arid Environments, 1996,

参考论文、报告、讲话

- [1]乌峰. 蒙古族生态观的哲学分析[D].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 [2]格·孟和. 论蒙古族草原生态文化[J]. 蒙古社会科学. 1996 第 3 期
- [3]吴国忠. 环境保护论文集[M].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8
- [4]苏大学. 内蒙古东部草地开垦调查报告[J]. 中国牧业通讯. 1998. 第 4 期
- [5]曹成有 蒋德明等. 科尔沁沙地沙漠化过程中植物种群生态位的变化[J]. 应用生态学报 2001. 12
- [6]张宽. 中国干旱、半干旱地土地开垦对荒漠化的影响——以甘肃民勤县和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为例[J]. 资源科学. 1999. 第 5 期
- [7]吴彤. 清后期内蒙古地区灾荒史研究初探[J]. 内蒙古社会科. 1999. 第 3 期
- [8]云和义. 清代以来内蒙古大量开垦土地的主要原因[J]. 内蒙古农业科技. 1999. 第 6 期
- [9]包和平 陈佰霞. 草原畜牧业生态系统及其内在矛盾的哲学刍议[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2007. 5
- [10]苏和 刘桂香 何涛等. 草原开垦及其危害[J]. 中国草地. 2005. 11
- [11]旁万才 董玉秋 高莲花. 兴安盟沙尘暴天气的气候学特征分析[J]. 内蒙古气象 . 2002
- [12]科右中旗“三化”草原五年规划 2006-2010
- [13]兴安盟土地管理局内部资料. [R]

- [14]胡箬. 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生态文明之比较[J]. 理论导刊. 2005. 11
- [15]欧军. 草原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比较[J]. 文科教学. 1994. 1
- [16]赵悦秋. 对兴安盟脱贫致富的反思[J].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2002
- [17]吴琼. 自然生态环境与游牧文化[J]. 新疆社科论谈. 2000. 第1期
- [18]包玉山 周瑞. 内蒙古草原牧区人地矛盾的加剧及缓解对策[J]. 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 第3期
- [19]乌兰图雅. 20世纪的科尔沁的农业开发与土地利用变化[J]. 自然资源学报. 2002. 第2期
- [20]崔延虎. 游牧民定居的再社会化问题[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2002. 第4期
- [21]樊江文. 50年来我国草地开垦状况及其生态影响[J]. 中国草地. 2002. 第5期
- [22]额尔敦扎布. 草原荒漠化的制度经济学思考[J]. 内蒙古大学学报. 2002. 第5期
- [23]恩和. 草原荒漠化的历史反思: 发展的文化维度[J]. 内蒙古大学学报. 2003. 3
- [24]敖仁其. 草原产权制度变迁与创新[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03. 第4期
- [25]何天明. 对草原文明和建设内蒙古民族文化大区的思考[J]. 民族问题研究. 2004. 第4期
- [26]苏和. 草原开垦及其危害[J]. 中国草地. 2005. 第6期
- [27]常宝. 现代化与牧区传统社会变迁[J]. 内蒙古大学学报. 2006. 第2期
- [28]格·孟和. 和谐是游牧生态文化的核心内容[J].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6. 第2期
- [29]张志民 延军平 张小民. 建立我国草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政策建议[J]. 人文地理. 2007. 第4期
- [30]敖仁其 胡尔查. 内蒙古草原牧区现行放牧制度评价与模式选择[J]. 内蒙古社会科学版. 2007. 5
- [31]海山. 内蒙古牧区贫困化问题及扶贫开发对策研究[J]. 中国畜牧杂志. 2007. 第43卷 第10期
- [32]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局. 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现状调查报告. [R] 2001.
- [33]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 [R].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 12 第1版。
- [34]布赫. 内蒙古大词典 [Z].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1
- [35]内蒙古自治区畜牧厅修志编史委员会. 内蒙古畜牧业大事记[Z].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36]关于“十七大报告”生态文明建设重要论述 [N]. 人民日报. 2007年10月
- [37]刘严随 陈百明. 中国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地理利用[J]. 覆被变化研究. 2002. 2

致 谢

在论文落笔之际,回首三年光阴,心中感慨万千。

衷心地感谢我的导师孟庆国老师。三年来,恩师以他广博的知识、务实的学风、孜孜不倦的工作精神和平易近人的品质深深地感染我、教化我,令我终身难忘。本文正是在恩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同时还要感谢恩师包勇老师和乌峰老师的关心和教诲。论文从选题、设计、修改到成文,都倾注着三位恩师无尽的心血,没有他们的启发、督促和悉心指导,论文难以完成。在此,感谢三位恩师对学生的谆谆教诲、无私的关爱和殷切的希望。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我将铭记恩师的教诲,以恩师为楷模,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真诚地感谢教过我的所有老师,包和平、扎拉嘎、张振芳老师,正是他(她)们治学的严谨和为人的友善,使我既增长了知识又启迪了人生。

感谢一起走过的同窗好友,红英、文枝、金哈斯、乌力吉巴特尔、高志国、高岩、宝音满都拉、吉日嘎啦、赵广伟。在这三年里,如果没有他(她)们的陪伴与帮助,我的这段岁月会暗淡许多,单调许多。能与他(她)们认识是我的幸福。

感谢我的家人,感谢他们以最纯朴的亲情一如既往地支持我,是他们的关心和支持使我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顺利地完成学业。

最后,感谢多年来关心和帮助过我的朋友们,感谢多年来关心和帮助过我的所有人。

英格
2009年4月